

# 一柄开启北京大学“后花园”的金钥匙

■奚牧凉

《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的作者何晋教授,在该书的“序”中写道:“对比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大变化,燕园象牙塔内这些文物、古迹的变迁,也不能脱身于外。也许因为琐小,它们将来并不会在宏大叙事之列,但未必不关乎其大。”

2001年,“未名湖燕园建筑”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决定意味着,现北京大学校园内、以未名湖为中心的原燕京大学教学、宿舍区,在法律层面被核定为如今国内最高等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作为当年全国1200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一例,可以讲“未名湖燕园建筑”因此被授予了充足的研究、保护重要性,即便将其与故宫、秦兵马俑等文物保护单位等量齐观,一视同仁,也不足为奇。

但反过来看,“未名湖燕园建筑”并不能与如今的北京大学校园划上等号。众所周知,“燕园”最初是燕京大学的校园。由美国建筑设计师亨利·墨菲设计的燕园,是将清华大学以西、圆明园以南的淑春园等园圃整合、重建后的产物,燕京大学1926年迁入燕园,而最终燕园落成已是1929年。至于“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其民国时期的校址曾位于故宫东北一带,包括现五四大街北侧的“红楼”。直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分拆,北京大学才来到燕园。而后,北京大学进一步扩大校园面积,

如在原燕园南修建教学楼、教工学生宿舍等,终至如今格局。燕园逐渐成为北大校园的爱称。

可另一方面,虽然北京大学在其120年的历程中,多次与祖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密切相关,如今的北京大学也仍然是中国高校中的翘楚,但它毕竟有别于故宫、秦兵马俑这类日常开放甚至收费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校外人员进入北京大学校园的审查时而宽松时而严格,这就让“未名湖燕园建筑”成为了半公共半校园的存在;对于校外人员而言,未名湖、博雅塔似乎象征着难以企及的最高学府,而对于校内师生而言,未名湖、博雅塔又好象代表着诗化的校园记忆。看起来,“未名湖燕园建筑”既不能成为世人共享的历史记忆,又没有成为师生熟稔的文物常识,它更像一片有待发现的“后花园”,正如歌中唱到“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都藏在水底”。

由此说来,我们便可以尝试理解何晋教授前述于《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之“序”所言,以及他撰写的序言的意义。这固然是广大读者都可以阅读、购买的文物知识图书,何晋教授拿出他此前专攻先秦史的考据功底,“慢慢搜集有关材料,拍摄照片,希望对于它们有清楚的了解和认识”,最后完成了这本条分缕析地整理、介绍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的专著。但另外一面,《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也可以看做是何晋教

授这样一位1988年起就一直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求学、任教的“北大”人,对母校的一次探寻之旅。自认曾“对整个燕园所知并不全面和透彻”的何晋教授,为他自己也为每一位“北大人”,将仿佛珍藏在自己的“北大记忆”之中,但实际上自己并未清晰明了的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以文字的形式具体化了,《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是一把献给所有师生以开启北京大学“后花园”的金钥匙。何晋教授几乎没有在陈述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时,夹杂太多个人情感与体会,整体行文追求简洁、客观、准确,但对“未名湖燕园建筑”中的每项文物,无论知名度与重要性,此书都做了详尽的梳理,相信此书的读者也能各取所爱。

以《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中的“静园六院”一节为例。静园六院曾经是燕京大学的女生宿舍,如今已经成为北京大学部分文科机构的办公场所。自我2010年本科入京北大后,静园六院就是我经常路过之地,但因为于此地办公的老师与我并不甚相关,所以我真正踏足其中的经历,回忆起来也不太多。于是乎,此书“静园六院”一段便让我对这里的了解有血有肉了起来;我才知道,当年这里“每个院落都有一个小餐厅在二楼中部,按一下电钮,带有托盘的升降机就可以直接把地下室中厨房做好的饭菜送上来”;而当年燕京大学的学生,“在每年春季的‘宿舍开放日’(Open House Day),男生、女生可

以互相参观宿舍,此日男生方得进入这些院落”。

《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全书以一例例篇幅不长的文物、古迹介绍段落串联而成,穿插提示必要的燕园故事。它不以燕京大学、北京的历史为线索,而作具体项目百科全书式的目录,按园子进行梳理,并配以手绘地图使读者可以按图索骥,以便于对其心有感念的读者快速查阅、理解此书提供的相关知识,进而弥补甚至强化读者与北京大学的情感联结。

所以由此看来,《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更像是一次“公共史学”亦或“文化遗产批判理论”理念影响下的“历史/文化遗产写作”。西方世界二战后,法兰克福学派、福柯等思潮投射进历史学、文化遗产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中带来了一大理想现象是,破除所谓“专业”“正统”“宏大叙事”的历史书写与文化遗产认知一家独大的局面,开始尊重每个个体、社区对历史与文化遗产的自主判断与表达,以此将传统的历史学与文化遗产学有意无意剥夺走的文化多样性权利,交还给公众。

《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并不聚焦中国政治史、文化史,甚至不直接梳理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史,而是具体而微且等量齐观地介绍每一例文物、古迹与历史,进而满足读者智识与情感上的需求,最终在这些“利益相关”的读者之中为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

的重要性“赋权”。而由此,或许即可诠释何晋教授“也许因为琐小,它们将来并不会在宏大叙事之列,但未必不关乎其大”所表达出的,此书写作方式与学术视角的与众不同与别有用心之处。

于是我们也可以理解,《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的最后,为何专门辟有“其他文物与文物保护”一节,用图文的形式介绍“因残损、碎小而散落不为人知,或因仍在日常使用而被人熟视无睹”的文物、古迹,以及如今燕园面临的文物保护压力。只是可能囿于何晋教授的史学而非文化遗产学背景,《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虽然涉及了诸多既不在“未名湖燕园建筑”保护范围内,又年代比较切近的纪念地,但并未大胆将内容全面扩展至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16-27号宿舍楼,乃至上世纪末建立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理科教学楼等北京大学当代建筑,也就是说并未彻底突破“文物需有一定的年代积累”的文化遗产学观念,转而有力贯彻“只要利益相关者认为其承载的历史不应逝去,其即可被视作该利益相关者的文物”的文化遗产批判理论观念。事实上,如16-27号宿舍楼,正是在普遍未被人们视作文物的大背景下,正在遭受着次第被拆除的命运。如果《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能将目光一并扫至这些“文物”,此书之于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的学术乃至社会意义,怕是会更加不可小觑。

※ 本版书书



《梅毅说中华英雄史》  
梅毅著  
天地出版社2018年出版

从古至今,中国人的英雄情结不曾改变过。时代召唤英雄,历史作家梅毅(赫连勃勃大王)的作品《梅毅说中华英雄史》适逢其时由天地出版社隆重推出。梅毅从2003年底开始写历史,当时创作全凭兴趣,从两晋南北朝写起,这一历史阶段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分裂和最为混乱的年代,他写成了《华丽血时代》。“学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梅毅沉浸在“乐之”阶段把对历史的书写当作一种精神寄托。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曾提出解说历史的四个条件:第一要有资料;第二作者要有大见识;第三要有史家的品德;第四要有小说家的想象力。梅毅力求自己在写作中实现四者的统一。把枯燥寥寥的史料记载转化为视觉形象,如同把大量的历史镜头带入人们的视野,他力求笔下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让读者觉得历史不再冗长沉闷。梅毅的优点在于他笔墨中的文学性、故事性和趣味性,“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他认为没有笔墨的功夫,历史写作不会有太长久的生命力。

在梅毅的写作体验中,写历史最重要的品格是“客观”。他描绘的大平天国一段迥异于以前的体例,每一篇都有一个附录,把当时人们眼见的史实记载附在后面。他的写作就事论事,对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非常肯定,至于洪秀全,以他所谓500首《天父诗》为例,只有10首是讲政治的,其余490首均是写他“教诲”官内的嫔妃怎么伺候自己,梅毅相信大家会通过这些记载确立对这些人的评判。

梅毅与众不同的历史写作,还在于他能用现代意识回顾以前的历史,从人性角度细腻观察历史。他笔下的人物个性鲜明,朱元璋、朱棣、张献忠、李自成等皆在梅毅笔下得到淋漓尽致且颇具颠覆性的重新描述。对于明代史中很多杀人、屠城、灭十族等残暴行为,梅毅又展现出按捺不住的批评姿态,以尖刻的语言回溯那一段让人不忍卒读的历史。(红娟)

# “蹴鞠场边万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

■郑学富

我国古代称足球为“蹴鞠”,最早有文字记载是《史记·苏秦列传》:“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箫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说的是战国时纵横家苏秦到齐国游说齐宣王连横抗秦时所见到的情景。由此可见中国的足球运动始于战国时代。那时候的足球是用毛发充塞,到了唐代则改为充气皮球,里边用猪尿泡作球胆,吹满气封上口,外边再用八片厚皮子缝起来。唐玄宗的重臣徐坚在《初学记》中说:“今蹴鞠日戏盛。古用毛纤维结之,今用皮,以胞为里嘘气闭而蹴之。”宋代的蹴鞠制作技术有了进一步提升,工艺精良,已接近现代足球。足球运动规则也更加完善。

宋朝从皇帝高官到贫民百姓无不热爱踢足球,风靡全国。宋代著名画家苏汉臣绘有《宋太祖蹴鞠图》,描绘了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与其弟赵光义、大臣赵普、赵昭辅、党进、石守信一起踢足球的情景,

说明了当时蹴鞠是宋代初年军中的一项体育活动。明代文人唐文凤有《题蹴鞠图诗》说:“举世群雄竞逐随,明良相逢同一时。会合正遇风云期,乘闲且复相娱嬉。军中之乐亦宜,青巾白袍大耳儿。”宋代皇帝爱踢球,喜欢看足球当时普遍现象,据《宋史》记载,宫中举行重大活动都有足球表演。宋徽宗赵佶就是个足球高手,他在皇宫里成立了一支拿国家俸禄的专业球队,专门陪他踢球。每年在他过生日的这一天,文武百官祝寿之后,皇宫里的球队都要进行踢球比赛。在都城汴梁,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蹴鞠茶坊”和“角球店”,出现了许多专门制作足球的手工业作坊,有品牌的就多达24种。

在有关宋朝的一些史书和小说中多有足球的记载。小说《水浒传》有一段文字描写尚为端王的赵佶踢球的情景:“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身穿紫绣龙袍,腰系文武双穗绦。把绣龙袍前襟拽扎起,揣

在儿儿边。足穿一双嵌金线飞凤靴,三五个小黄门相伴着蹴气毬。”正在踢得难解难分之际,一个球飞来,端王没接着,滚到了人丛里。“那高俅见气毬来,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一看此人踢球本领不在自己之下,便让他来一起踢。“才踢几脚,端王喝采。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样,这气毬一似骊胶粘在身上的。”端王顿觉找到了知音,等他当了皇帝后,提拔“踢球高手”高俅做了太尉。

在宋朝靠踢球升官发财者何止高俅?宋太宗时有个张明,出身卑微,但是球技高超,经常陪太宗踢球,太宗非常喜欢他,提拔其任右羽林军大将军。真宗朝宰相丁谓擅长踢球,球技也是十分了得。新晋进士柳三复也擅长踢球,他得知宰相常在相府后花园踢球时,便天天去园外等候,寻找机会。终于有一次丁谓用力过猛,将

球踢飞墙外,柳三复如获至宝,头顶着球入内求见。只见柳三复纳头便拜,头上的球即刻转到肩或背上,头抬起时,那球又翻到头上,拜揖再三,那球始终在头、肩、背之间旋转,不曾落地。丁谓叹为观止,不禁连连称赞,便留作门客。

宋代除了皇宫官府有足球表演的专职人员外,民间也不乏高手,并且球场林立,踢球者如云。司马光曾有诗曰:“东城丝网蹴红毬,北里琼楼唱石州。”张舜民也有“宝马嘶风车击毬,东市斗鸡西市鞠”的诗句。宋朝的足球运动在城乡非常普及,全民踢足球。陆游《戎车》诗说:“乡村年少那如此,处处喧呼蹴鞠场。”竟成了清明寒食节必有民俗活动。梅尧臣有诗云:“蹴鞠渐知寒食近,秋千将立小鬟双。”陆游曾描写道:“寒食梁州十万家,蹴鞠秋千尚豪华。”

吴自牧的《梦粱录》记载南宋临安城:“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仕宦者为之,盖一等富家郎君,

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

当时宋朝还有齐云社,相当于现在的足球协会或足球俱乐部。《水浒传》第二回写道,端王邀请高俅下场踢球,高俅不敢,端王说:“这是‘齐云社’,名为‘天下圆’,但踢何妨。”陈元靓的《事林广记》也有诗曰:“四海齐云社,当场蹴气毬,作家偏著所,圆社最风流。”比赛时球队分为左右队,球员最多达16人,队长称为“球头”。《武林旧事》卷四“乾淳教坊乐部”曾详细记载球员名单:“左军一十六人:球头张俊、踢球王怜、正挟朱选、头挟施泽、左竿网丁述、右竿网张林、散立胡椿等;右军一十六人:球头李正、踢球朱珍、正挟朱选、副挟张宁、左竿网徐宾、右竿网王用、散立陈俊等。”“胜者趾高气扬,风光无限;输者垂头丧气,黯然失色,队长的脸上还要被抹上白粉。场外观者云集,人山人海。陆游有诗描写道:“蹴鞠场边万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

# 古代帝王的“炫富”与“装穷”

■王丹普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时代,作为全天下头号富翁——皇帝,贵为天子,富裕有四海,他是全国权力、财富最大也是最合法的拥有者,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也在情理之中,“炫富”就大可不必,至于“装穷”更是不可理解。然而,在历史上确有一批皇帝在“装穷”,也有一批皇帝在“炫富”,还有一批皇帝既“装穷”又“炫富”。这些皇帝都是何许人也,他们到底是因何缘故?

齐后主“装穷”为乐

武平六年(575年),一个特殊的“贫困村”在北齐最奢华的皇家园林——首都的华林园成立了。最为蓬头垢面、衣衫蓝缕的“贫儿”竟是北齐皇帝——后主高纬。他是以这种独特的扮相和方式,追求一种“行乞其间为乐”的快乐。他既不是为了献爱心,也不是为体验贫儿生活。他继承了祖宗的奢靡之风,而且发扬到极点。他皇宫的一条裙子的费用高达上万匹锦缎,因为相互攀比新奇,往往早上刚穿的新衣,下午就扔掉。他修宫殿更是追求雄伟壮丽至极,而且随意推倒重建。他当皇帝以后,工程从未停息,晚上都是打着火把加紧施工,冬天就

烧开水和泥继续修建。他在晋阳西山开凿一尊大佛,每晚点灯就要烧掉上万盆油,火光都能照到几十里之外的宫中。

齐后主“装穷”为乐,已属千古奇观;更有甚者,宋后废帝以受辱喜悦更是旷世奇谈。南朝刘宋后废帝刘昱,经常化名微服出行,放着皇冠衮衮不戴,却总是捉襟见肘的平民打扮,无论军营、官署还是寻常巷陌,他都能任意穿行。甚至夜里就投小旅店,有时候白天竟躺在大路边睡觉,他还喜欢与各色人等讨价还价,交易中经常遭到谩骂侮辱。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不但生气,竟然能欣然接受,并以此为乐。这两类装穷真有点过分,甚至于变态。

先“装穷”后“炫富”的杨广

开皇二十年(600年),隋文帝来到二儿子杨广的王府。发现侍者全是身穿粗布旧衣的年老貌丑的妇女,帷帐都是劣质的素纱。乐器不仅断弦无续,而且布满灰尘。他还听说,杨广只和王妃恩爱,从不近别的女人。他就认为,晋王杨广生活俭朴,不好声色。后来,还立杨广为太子。殊不知,杨广生活奢侈无度却故意装穷,声色好纳,却装作不近女色。他和许多女人都生孩子,却不养育。来客

时,他就故意把美女都藏匿起来。他父亲去世当晚,他就强奸了父亲一个爱姬……

当皇帝后,他一反“装穷”的常态,变本加厉地“炫富”。大业元年(604年),刚登上皇帝宝座的杨广修建西苑,方圆二百里,其中仅开挖一处叫“海”的人工湖,周长就达十多里,再堆出三座仙山高百余尺,山上还建满了台观宫殿,错落有致,巧夺天工。沿渠修建“十六院”,每院住一位四品夫人,建筑穷极华丽。秋冬树木凋零之后,用彩锦剪成华丽的树叶,张贴在枝条上,色彩渐变就焕新的,就像阳春一样茂盛。彩锦剪成荷枝菱花,即使结冰也要凿开冰面装饰如常。十六院的夫人们也竞相攀比,用美味佳肴讨杨广的欢心。

杨广还修成全世界最长的运河,两旁还筑御道,栽上柳树,沿途还建起行宫四十多所。派官员一次造船数万艘。他所乘的龙舟有四层,高四五尺、长二百丈,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一百二十多个豪华房间,全用金玉装饰一新,层底全是内侍。皇后的船尺度略小一点,豪华程度却和龙舟一样。另外,还有九艘三层的观光船,堪称水上宫殿。王官贵族、外国使节、僧道方士等随行人员和御林军的船队

多达数千艘、长达二百多里,拉纤的士兵八万多人,仅负责为豪华船只拉纤的人就达九千多人,称为“殿脚”,都穿锦彩做的制服,船队所过,照耀川流,旌旗蔽野。虽然船队装满了生活用品,但还是命令五百里之内的州县,提供食物。每个州要供应一百多车车珍美味,以致乘员吃腻了,大多丢弃掩埋……大业三年(607年),他让工匠造了一台名叫“观风行殿”的巨型战车,可以乘侍卫数百人,可以任意分合,再装上车轴,运行自如。行殿外又建起“行城”,周长二千多步,用木板作城墙,上面再贴上布匹,画上精美壁画,工事和装备一应俱全。

经常“出家”的梁武帝

大同十一年(545年),梁武帝萧衍真诚地向世人表白:“非因官宴会,从不吃国家的东西,我官中的人也不吃国家的食品。所有建筑都不用国家材料和工匠,都是我出资雇人借钱建成的。我修行三十多年不行房事,居处不过一床之地,没有任何雕琢装饰,也没有饮酒、音乐等爱好。每天只吃一顿饭,现在消瘦得腰围只有二尺出头了。天监年间,我信佛以来,戒掉鱼肉,每天仅一餐,不过是青菜汤、粗米饭。经常忙到

中午,仅仅啖个口就当吃饭了。我身上就穿着粗布衣物,床上仅用木棉帷帐。一顶帽子要戴三年之久,一条棉被也要用两年以上,嫔妃都穿短衣布裙……”听他一席感人心肺的话,好像觉得这是一位艰苦朴素的和尚皇帝。然而,梁武帝从普通元年(520年),就开始经常“出家”。他仅出家同泰寺就达四次,朝廷百官为他出“赎身”钱就达四亿之巨,国库为之空,国力一蹶不振。第一次是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三月八日。第二次是大通三年(公元529年)九月十五日出家,十天后天武百官捐钱一亿,请求赎回“皇帝菩萨”。第三次是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四月十日出家,这次群臣用两亿钱将其赎回。第四次是太清元年(公元547年)三月三日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朝廷又出一亿“赎身”钱。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梁武帝倡导下,南朝兴建寺塔之风盛行,一时间寺院林立,而且规模宏大,雕梁画栋。经后人考证,南朝佛寺可稽者凡二百余所,其他失名、不见经传者则不计其数……仅南朝建康成风,已达到灾难化的程度了。和尚皇帝打着道义的幌子“装穷”,实则是灾难性的“炫富”。(红娟)



《说给儿童的中国历史》  
陈卫平 沙永玲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一套适合10岁以下孩子阅读的历史书,选出了自盘古开天辟地到清朝末年,影响中国历史的杰出人物,包括文学家、艺术家、冒险家、发明家、教育家……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述这些历史人物的精彩事迹,为孩子构建一个完整清晰的中国历史轮廓。

作者陈卫平、沙永玲曾编写过《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写给儿童的世界历史》,出版后反响甚好。策划《说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一全新作品,作者系重点考虑怎样将历史人物和事件通过最有效、最能吸引孩子的方式传达给幼童。书中配套的有声故事运用声音的力量,在孩子熟悉文字符号之前,让孩子提前走进他们的生活,为孩子读历史、听历史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氛围和“模拟体验”的感受,同时激发孩子对历史的多元化思考。(红娟)